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3003

“听物”而“生声” ——论“生生美学”与声音生态意识

楼昉

(新疆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程相占提出的“生生美学”,在生态美学领域成功突破欧美话语的主导地位,扭转了“以西释中”的被动局面,建构起具有中国自主性的生态美学理论话语。这一理论所立足的“生生哲学”,其审美内核与中国传统审美范式中“听声观物”的认知方式天然契合;而现代声音生态意识,亦与“生生美学”的内在逻辑、理论内涵高度同频,可为“生生之美”的实践创造提供关键资源与有力支撑。凭借自身蕴含的文化想象力与社会形塑力,听觉与声音在“生生美学”“共生”要义的启发下,有望通过声音生态共同体的建构,为当代中国生态美学话语的现代化革新与国际化转型,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生生美学”;中国生态美学;声音生态;声音共同体;听声观物

中图分类号: B83-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6)03-0019-09

“Listening to Things” and “Generating Sounds”: On Sheng Sheng Aesthetics and Awareness of Acoustic Ecology

LOU Y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Sheng Sheng Aesthetics”, proposed by Cheng Xiangzhan, has successfully challenged the dominance of Western discourse in Ecological Aesthetics, reversing the long-standing passive position of “interpreting Chinese culture with western elements” and establishing a theoretical discourse grounded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autonomy. Rooted in the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 of life”, this aesthetic paradigm naturally aligns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ode of cognition embodied in “Listening to Sounds and observing Things”; Moreover, contemporary awareness of acoustic ecology resonates strongly with the internal logic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Sheng Sheng Aesthetics”, offering crucial resources and solid support for the practical creation of the “Beauty of Life”. With their inherent cultural imagination and social formative power, hearing and sound—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re principle of “Coexistence”—hold the potential to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coustic ecological community. Such a community may provide practical path for both the modern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ecological aesthetics discourse.

收稿日期: 2025-12-18

基金项目: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部级课题重点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新时代民族文艺评论话语体系建构研究”(ZGWLBJKT20251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周易》自然美学思想研究”(23BZX044)

作者简介: 楼昉, 男, 山东济南人, 新疆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Keywords: Sheng Sheng Aesthetics; Chinese ecological aesthetics; acoustic ecology; acoustic community; listening to sounds and observing things

作为中国本土性生态审美范式,程相占提出的“生生美学”在欧陆现象学生态美学与英美分析哲学环境美学之外别开蹊径,构建出中国自主生态美学话语。“生生美学”在中国“生命美学”的基础上推演而来,蕴含生态之美、生命之美与意境之美等多重意涵,其在挖掘和荟萃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同时,为从生态美学角度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与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观提供了重要启示。“生生美学”的理论材料源头是“声音”^{[1][3]}。音乐及乐论不仅奠定与表征了中国古代社会在文学艺术审美与治世伦理等方面的基本规程,也形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根基。纵观“生生美学”20年的理论发展进程,不难发现其为进入听觉与声音生态维度敞开的入口。声音生态意识不仅为“生生美学”提供思想资源,也参与了“生生美学”的话语生成及“生生之美”的审美过程。

“生生美学”的声音生态观既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客观声响,又包含人类的主观听觉感受。“声音生态学”(Acoustic Ecology,又译作“声音生态”“声响生态”与“听觉生态”等)是当今“声音研究”(sound studies)的关键概念之一。加拿大学者谢弗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声音生态学”和“声音景观(Soundscape,下简称“音景”)设计”实践构想,目的是降低现代化、工业化噪音对环境生态的损害,重建有益于人与自然栖居环境的生态化音景。声音理论自此跻身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讨论范围。现代声音生态意识的萌发,几乎与西方的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兴起同步发生,它们同为当时全球环境运动思潮的支脉。由此可见,声音生态与生态批评之间联系紧密,声音生态意识构成了生态美学的重要内涵。新媒介时代,“读图”“拟像”以及“景观社会”等现象盛行,视觉成为主导性的感性力量。

在此背景下,深入发掘“生生美学”与声音生态意识的内在关联具有鲜明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这不仅是对“生生美学”理论源头(声音)的回溯与深化,更是为其“生生不息”的核心特

质寻找具象化、实践性的表达载体,让植根于中国传统的生态美学理论获得可感知、可参与的鲜活形态;同时,这种关联的建构也为声音生态意识提供了兼具文化根基与哲学高度的理论支撑,打破了西方声音生态学的单一话语局限,赋予声音生态研究以中国文化特有的“天人合一”“共生共存”思维内核。因此,有必要在“生生美学”理论框架内,进一步拓宽“声学视野”(acoustic horizon),通过二者的互释互证,丰富“生生美学”的感官维度与实践路径,为中国生态美学理论话语实现现代化、国际化转型提供切实可行的听觉与声音层面的策略,为全球声音生态问题的解决贡献中国方案。

一、“生生哲学”与“听声观物”

在哲学基础方面,“生生美学”以中国传统哲学话语为理论资源。“生生美学”以中国生态观念为统摄而构建出的“生生哲学”,与中国传统的听觉及声音审美范式高度相关。“生生美学”所依据的“生生谓之易”凸显流动不止、变动不息的生命创造。这一创生性,与声音和听觉在中国传统审美中的美感生产性暗中契合。中国古典文学专情于对听觉和声音的记述与表达,因为听觉能调动全身心的情感投入。听觉在文学作品与日常生活中常通过“以声类声”和“以声类形”等表现形式,强化文字和语言的表现力。在听觉和声音作用下,中国古代叙事形成了“‘尚简’‘贵无’‘趋晦’和‘从散’”^[2]的表述特征。程颢的“以道观物”“以理观物”或“以物观物”的天人合一境界,是“生生美学”在审美观物层面的核心要义。在此意义上,“生生美学”的“通物”(compassion)^[3]思想,也与由听和声音想象引发的“通感”体验互通。“听声观物”通常引人无限遐想,可放大审美效果并延伸意义解读范围。“听”包括听觉感受、听的行为以及听的后果等。“观物”是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包含捕捉、感知和内在反应等环节。“生生美学”的生态审美

理念以“生生哲学”作为坚实根基，深入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听觉与声音哲学的智慧精髓，展现出与中国传统审美范式中“听声观物”之法相契合的审美逻辑。

麦克卢汉曾谈到，“中国文化较于西方文化更为优雅，感知更为灵敏。但中国人是部落社会（tribal），是‘听觉人’（people of the ear）”^[4]。中国古典审美范式中存在诸多观物、应物机制，其中之一的“听声观物”，对后世国内外美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钱锺书曾从中西诗歌比较角度出发，比喻中国诗歌是“怀孕的静默……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Whitman）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除非耳朵太听惯了麦克风和无线电或者——”^[5]在宋明理学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之前，中国古典诗歌的诗境主要以“寂”“静”“空”“幽”为基调，其声音表象之下蕴含丰富的生态思想。

“听声观物”的妙处，可从“无声”的古典诗歌文本及思想性论著中进行体悟。一方面，中国古典诗中“物各自然”的传统智慧，常以声音的比喻、象征作为呈现方式。庄子与郭象所言“物各自然”，推动自然山水景物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美感观照的主要对象。“物各自然”的主张被表达为“天籁”——“籁，箫也。夫箫管参差，宫商异律，故有短长高下万殊之声。声虽万殊，而所禀之度一也。”（《庄子·内篇·齐物论第二》）柔和、包容的万籁之声是表达自然之“道”的最佳载体。“齐物顺性”的思想保持事物天机的完整性，山水自然就是完整的天理。另一方面，中国诗以意象为主、命题为辅，只不过意象在多数时候代替了命题“说理”“说情”的表达功能，也即“以感代思”。同时，中国古人的认知惯例为“闻声知情”，“信奉的不是‘视即知’而是‘听而察’”^[6]。“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与“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其中寂静的音景能催生读者全心倾听的冲动，读者也只有调动多种感官进行整体性审美才可获得对诗歌意境的领悟。中国诗中“外声内听”的传统最大限度发挥了读者对诗歌述义想象力，这是一种“完全而不碎片化，不扭曲，没有疏离感”^[7]的艺术表现方式。

听觉同视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等感官接受

的殊异之处在于，听觉无需消解审美距离，听觉本身就是对距离的消解。“生生美学”相较于环境美学与其他生态思潮而言，超越性之一，正是其突破现代审美对于客体的孤立审美逻辑，代之以变动不居的眼光，将审美对象放置于系统生态当中进行整体性审美。如此，审美之人既是主体，又融入生态中，成为客体。因而，由道家哲学生发的“听声观物”审美方式与声音生态观念，诠释了“生生美学”主客体融合的整体性、连续性与动态性特征。在“听声观物”的启发下，声音生态可成为“生生美学”的生态审美范式中一块别有意趣的领地；瞬息万变的聲音与听觉感受，可极大拓宽“生生美学”的审美界限和对象范围。

西方生态美学最初是将自然视为审美的客体的，不过，中国的生态美学传统更强调人与自然相融，以及“物”“我”相通的“主客一体”思维。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道家思想具备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显著特征^[8]。有听觉主体在场的“万籁齐响”并不代表真的声响，而是突出环境的寂静无声，意在揭示话语背后无限的意义阐释空间，凸显整体生态的在场。在此影响下，中国美学视域或审美对象的要旨在于领悟所谓“弦外之音”。可以看出，中国道家古典美学与文论思想对声音的运用，更倾向于对抽象“声音”概念以及听觉内在反应象征意义的借用。中国的“听”与“悟”紧密关联，如刘勰的“秘响旁通”、严羽的“空中之音”，以及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论诗时提出的“幽人空山”等。其“因听而知”，创造了“言者不知，知者不言”和“得意忘言”等进入“无名”的路径。道家思想为中国生态美学的声音生态意识提供了审美主客体融合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等意义空间，助益“生生美学”发掘美学意味、扩展审美意境。

“生生美学”的核心内涵来自儒家哲学，尤其是易经思想。在儒家思想中，有关音乐的论述为“生生之美”开拓了五个层次的美学内涵，分别是历法与乐律合一的历律和谐、乐以成人的礼乐教化、乐以开风的生物生民、乐者乐也的乐身正心，以及最终统摄于“中和之纪”的“中和之美”^{[1]39-47}。儒家传统同时注重感官经验与经验的意义内涵，视二者为一体两面的关系。“生生美学”将儒家礼乐思想摆在首位。“乐”等同于“礼”，“礼”

是支撑“乐”获得重要话语地位的合法性根源。中国古代的乐论与美学无涉，“乐”实则作为“礼”的分支被讨论。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并不关注声音本体的音调、音色、和声与节奏等，而是关注“音”的外部社会经验。“声”与“音”并不相等，“声”是物理意义上组成“乐”的客观材料，而“音”则是“乐”经过提炼、系统化、规范化和伦理化后的成分^{[9][42]}。虽然儒家思想忽视声音本体，但儒家礼乐思想明确地指出，人们对音乐的听觉接受，实际是由声音引发的伦理学共鸣而产生的情感与意志上的认同。“音”是情感符号，“乐”和“礼”既表达和反映社会伦理准则，又是重要的情感运作机制。《乐记》有“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之说，《诗大序》将其发展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在一定意义上，这与“听声观物”的“外声内听”方式相符合。

“生生美学”以儒家“乐之中和”的“中和”状态作为判定美的标准。儒家开创的中国音乐美学，影响了诗词、文赋、戏剧、小说以及书法等中国古典艺术的创作。相较于道家的声音生态意识，儒家思想填补了社会伦理教化层面的空缺，奠定了中国文化整体对自然和社会声音生态的想象与观念。不过，若只考量儒学一家，那么如“声有无哀乐之辩”呈现的内在矛盾则难以解释。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提出，“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表示音乐的声音符号本无情感与思想，一切从音乐中获得的情与思，均是人的主观感受。但事实上，某种确切的情与思，又确乎寄寓于具体对应的声音之中。总之，“生生哲学”的儒学礼乐内涵弥补了道学声音生态意识过于看重审美之弊，而道家哲学“听声观物”对声音感受与情感生成的重视，又能够为儒家音乐思想补充有关听觉与声音审美的本体论思考。

二、“生生之美”与现代声音生态意识的产生

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意识与生态智慧，是“生生美学”进行生态审美的前提依据，也是创造“生生之美”的必要条件，而“生生美学”同样重视当代生态条件。现代声音生态意识的发生发展，与生态关切、人文关怀获得广泛认同具有近乎等同的历史语境。学界对现代音景理论的

讨论，旨在探索人与其所在环境中声音的关系，意图发挥声音的积极作用。在包豪斯式“工业设计”的影响下，谢弗借由音景分析展开“声音设计”（acoustic design）实践，尝试人类对声音生态的积极介入。“声音生态学”比照“生态学”观念，主要思考声音、生命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声音生态意识的出现与声学设计活动密不可分，所以声音生态意识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声音生态的美感生成离不开与声音有关的实践活动。因而，现代声音生态意识无疑会为“生生之美”的创造发挥能动作用。

音景设想的诞生与听觉生态、声音生态的骤然变化密切相关。自然音景与工业音景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构成针锋相对的矛盾关系。谢弗在20世纪60年代末创办“世界音景计划”（World Soundscape Project）；1993年召开首届“声音生态国际研讨会”（The Tuning of the Worl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 Ecology），并组建“世界听觉生态论坛”（The World Forum for Acoustic Ecology）。谢弗的声音生态实践是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浪潮的分支，后在建筑声学 and 都市规划等领域都有实践案例。谢弗在音景设想与声音生态理论中，明确借鉴道家哲学思想“智者乐水”作为其论述自然声音景观的开端^{[10][15]}。但他自己也承认，其观点带有较激进的自由至上、自然至上倾向。在其所述的“自然音景”（The Natural Soundscape）概念中，自然声音生态中的声响是高度保真（Hi-fi）的，听觉获得的声音信息饱满、具体。对于工业革命后的世界音景，谢弗等人将噪音带来的消极影响归咎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与进步，认为它们在动摇声音本体的同时，也导致了声音生态危机。

声音生态议题的内部探讨，以电气革命为重要分水岭。19世纪末，电磁录音技术、无线电技术等技术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声音技术的诞生，其彻底颠覆了声音既有的存在与传播模式。随着生产力的深刻变革，人造声音的响度持续攀升，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工业噪音不仅对自然生态造成污染与破坏，也对人类社会生态构成严重威胁。声音生态问题的产生，天然地与“自然”和“人为”之间的二元对立及互动张力紧密相连。“生生之美”的生发伦理，涵盖自然伦理与人类社会伦理两个

层面，其审美判断始终聚焦人与自然共存的生态关系，强调二者和谐共生。由此不难看出，深入探索声音生态的内在规律，能够为“生生之美”的塑造提供丰富的养分与灵感。从媒介史的角度审视，在当今跨媒介、融媒介时代背景下，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不断拓展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边界，听觉与声音在生产生活及文化领域的影响力愈发显著。因此，将现代听觉与声音的生态意识融入“生生美学”的生态意识体系之中，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声音生态的历时演变轨迹犹如一面镜子，清晰映照出生态文明与社会面貌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是二者互动情况的显著标志。因此，对声音生态意识的深入考量，必须置于“传统—现代”这一坐标轴之中，以此为基准展开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传统自然乡野与现代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之间，既存在着明显的断裂，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衔接。这种独特的历史演进过程，不仅造就了不同时代声音景观的巨大差异——从宁静悠远的自然之音到喧嚣嘈杂的工业声响，从质朴纯真的民间旋律到多元复杂的电子乐章；同时也催生了截然不同的声音生产方式——从自然天成的声音采集到人工合成的高科技声音创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现象与错综复杂的声音事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如同社会情绪的晴雨表，反身成为时代动向与社会风气的生动表征，深刻反映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特征与精神风貌。谢弗敏锐地捕捉到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作品中的一个重要观点。黑塞通过对古代中国社会的细致观察发现，“秩序井然年代的音乐总体呈现为平和愉悦，这一时代的政府亦如是；而动荡不安年代的音乐总体呈现为兴奋与激烈，这一时代的政府则是道德颓败的。如果一个衰颓国家的音乐是伤感、哀婉，那么其政府已陷入危机”^{[10]7}。此观点恰好对应《乐记》所述：“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11]1077, 1081} 因此，在观察与分析现代声音生态时，中国传统声音哲学可为全人类提供思考声音生态与人类社会间关系的思想智慧。

现代听觉审美反应，绝非简单的感官体验，而是一场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等多维度的复杂交互活动。在这一动态过程中，艺术家群体往往展现出对声音生态变化的敏锐感知与直接迅速的反应能力。他们以独特的艺术语言，捕捉并诠释着声音生态的细微变迁，如英国画家霍加斯（William Hogarth）于1741年精心创作的雕刻作品《愤怒的音乐家》，以极具冲击力的视觉形象，深刻批判了噪音对人类生活与精神的侵蚀；又如美国自然文学先驱梭罗、惠特曼等人的文学创作，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自然之声，表达对纯净声音生态的向往与守护。起初，声音生态意识的确带有鲜明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它将导致声音生态颓势的根源，直接归咎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无节制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挑起了视觉与听觉两种感官体验之间的对立，试图通过这种激烈的矛盾呈现，唤醒人们对声音生态问题的深切关注与深刻反思。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辩证与转折。事实上，现代声音技术并非全然是声音生态的破坏者，其在一定程度上也扮演了激活者与创生者的角色。它突破了传统声音传播与感知的局限，拓展了声音艺术的边界，创生了更为多元、丰富的“声觉空间”（acoustic space）^[12]，为人类社会带来有机、连续的时空感知。

电子时代轰然而至，电影、电视、广播与流行音乐等艺术形式凭借强大的创造力，精心构筑起一个个如梦似幻的视听奇观。这些奇观以极具冲击力的方式，将声音与听觉的巨大效用鲜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们再也无法对声音与听觉的重要性视而不见。由此，西方学术界展开了对“声音生态学”的深入阐发。这一理论聚焦人类对自然界无节制的破坏行为，特别是那些给人类听觉带来严重损伤的工业活动。现代社会，长期处于工厂噪音环境中的工人往往会患上听力疾病，这便是声音生态遭到破坏的直观体现。在乡村文明向城市化加速迈进的历史进程中，人造噪音如一股无形的洪流，野蛮地侵入自然生态环境，打破了原有的宁静与和谐，这一现象暴露出西方现代化模式在声音生态意识方面的严重缺失。这种负面影响并未局限于某一地区，而是随着全球化的浪潮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成为全球生态问题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对此，“生生美学”为我们提

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维度。其中,“continuity of being”(存有的连续性)这一理念,与声觉空间所呈现出的连续、绵延的认知方式不谋而合,二者相互映照,共同构建起对生命与存在连续性的深刻理解。“生生之美”秉持“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价值观,强调对万物生灵的敬重以及对生态之美创生的守护。它并非一味地否定技术进步,而是认为技术进步对于生态想象力、生态治理能力的提升有着积极的作用。具体到声音领域,现代声音技术同样是声音生态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声音技术不仅丰富了整体生态知识的内涵,为其在研究视角与方法层面提供必要补充,更能够在实际应用中发挥重要作用,助力实现声音生态的有效治理,为构建和谐的声音生态环境贡献力量。

在文学文本维度,声音生态批评是“生生美学”观照生态文学批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文学批评始终无法脱离文本的审美分析,而在文本细读中,声音生态维度的价值尤为凸显:一方面,生态文学作品中的声音书写与听觉叙事,能够直观映射生态场域的真实样貌及其内在结构状态;另一方面,“生生之美”的核心理念从思想精神层面为文学创作指明方向——它促使创作者树立对“生生之德”的自觉追求,进而深刻影响文本在捕捉声响、构建听觉叙事时,对声音表现机制与象征意义的考量和取舍。值得注意的是,听觉对一种文化的渗透与影响往往是谦和而深远的,这一点在中国语境下有着鲜明的体现——中国自古便有丰富的民间文艺、民族史诗等口传文化传统,它们以声音为载体代代相传,为声音生态批评扎根中国文化土壤提供了历史传统与现实基础。声音生态批评的价值,在我国古典美学传统中早已埋下伏笔:中国山水诗常以本真的自然姿态描摹自然景致与声音环境;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批评及文论思想,普遍偏向寂静、空灵的声音表达,这恰恰印证了中国美学对保全自然天机、彰显宇宙天理的核心追求。由文学维度可知,支撑“生生之美”的“生生之德”,本就蕴含以“中庸”思想为重心的声音生态意识。同时,“生生美学”诞生于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重要地位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中,因而“生生美学”又将立足中国立场,结合现代语境,针对声音现代性危机展开

深刻反思与主动回应。传统智慧与当代实践间的张力,更凸显出声音生态维度在生态美学研究中的独特价值。

此外,不论传统还是现代维度,听觉与声音都是“生生美学”向身体美学拓展的重要方面。听觉或声音能够为听者进入自然提供感性路径。可以说,听觉生态与声音生态研究,本就和生态美学具备共同的锚点。黑格尔将视觉和听觉界定为“认识性的感官”,对生态美的观物、分析等离不开这两个基本感官。“生生美学”在根本上遵循“天人合一”理念,在理论内部必定关注人的存在状况。同时,现代声音生态意识在萌发之初也表现出一定的人文关怀,而且在学理层面,声音生态还必须考量人的主观感受维度。一切有关听觉和声音的分析与阐释,其前提就已经包括了听者主体在场。因此,声音生态意识与“生生美学”侧重考察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探索和谐共生之道的核心逻辑高度契合。声音生态维度的纳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中国生态美学容易出现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偏向,让生态美学的价值取向更趋合理。

声音生态的提出,本意是将人的听觉感受置于其所在的生态文化中进行考量。声音生态批评,则是基于生态主义观念对听觉接受过程和环境声音现象进行审美和文化批判。“生生美学”生态伦理的另一关键核心是儒家的“仁爱”,其由“爱己”“爱人”推及到“爱物”。“生生美学”的话语建构重新梳理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既修正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偏差,也留意非人类中心主义陷阱。听觉与声音在人与自然之间架起了一道无形的沟通桥梁,生态批评所倡导的“由己及人、由人及物”的对话性实践,恰好能在声音场域中完成平等协商与价值互通过程。与此同时,作为生态研究的新兴维度,声音生态学的学理内涵并非固化不变,其始终处于动态建构与持续丰富的过程之中。“当代中国作家在进行生态书写时,一方面是对现代文明大肆归罪,另一方面就是对前现代文明过于理想化的美化想象……简单地返回前现代文明不是生态危机的破解之道。”^[13]因此,中国生态批评可以传统生态智慧为思想根基,合理运用当代声音理论,借助文化研究的方法分析听觉与声音经验在生态文化

中的功能，以“生生之美”的价值取向引导当代声音文化的发展。

三、“共生”与“共听”：建构声音生态共同体

“生生美学”不止于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生态价值观，更指向尊重、顺应和保护众生的道德观、生命观和宇宙观。因此，“生生美学”包含建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必需的生态哲学及美学面向。“生生美学”的最终追求是“人与天地万物共生的文明”^[14]。“共生”衍生自“共同体”（community）概念。“生生美学”的共同体追求，超越狭隘的“政治共同体”概念，是在更广阔的意义指涉地球整体的生态共同体，其在物质层面包含可见与不可见两方面，在历时维度上既关注传统又指向未来。声音作为重要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其不可见、不可触摸的物理属性，决定了它在特定空间中往往难以被即时察觉，但声音的影响力却真实而深刻，直接作用于自然与社会空间秩序的生成、维系与运作。不同强度的声响相互交织、有序排布，构成了声觉空间的生态性特质。具体来看，城市空间中，声音生态承担着塑造日常秩序与时间节律、区隔实体与虚拟空间边界的功能；自然空间里，声音生态则直观映射着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总体而言，声音生态及其承载的丰富信息，能够穿透表象，揭示出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中那些“不可见”的深层肌理。

“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5]若从感官史的角度出发，人类的声音经验触及人类文明的每一处角落。谢弗在系统论述自然音景时，事无巨细地罗列出自然生态圈中的生命和非生命体之声，如风水雷电声和鱼虫鸟兽声。当人类活动介入后，这些原始声音生态立刻被赋予浓重的政治与文化色彩。如人类对噪音的生产、消声及分配，引出声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噪音即权力”逐渐演变成“声音帝国主义”（sound imperialism）。声音的力量足以勾勒出巨大的声学轮廓，并且能够随意中断或主导一个文明的声音活动：“如果大炮是静音的，它们永远不会被用于战争。”^{[10]78}但在普遍情况下，声音的潜在力量总在不知不觉中发挥作用。比如，在网络数字媒体的信息风暴中，人们的注意力往

往不是被视觉信息，而是被听觉信号所捕获。即便声音曾被裹挟进对生态具有破坏性的活动之中，我们仍能从中窥见其内在的强大塑造力——这种力量完全可被转化运用，成为建构良性声音生态共同体的重要助力。而这一声音生态共同体的构建，可具体落脚于“声音共同体”（the acoustic community）的建立与完善。声音共同体的边界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动态变动之中——任何能够实现声学信息交换与流通的系统，都具备构成声音共同体的可能。对于栖居于特定声音共同体的成员而言，其生存境遇与生活方式，往往会受到该共同体内部声音信息的深刻制约与影响。事实上，中国古代先贤早已洞察到声音所蕴含的社会形塑力量。《乐记》将音乐各要素比配社会各阶层——“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怙懣之音矣。”^{[11]1078}可见，统治阶级期望利用“乐”之“礼”来规范社会发展，引导社会向理想的目标进步。

声音共同体依靠声音线索逐步建立，声音信号持续维系着共同体成员对日常生活的动态感知，并且在时间、空间和文化维度参与共同体的形构。

“生生美学”抱持的理念之一是将传统观念进行当代转化，以应对当下的生态问题，而听觉的现代性危机正是需要应对的危机之一。前现代社会的听觉方式以“共听”居多，而现代声音技术的出现解构了“共听”的必要性。20世纪移动电子声音媒介如随身听、MP3的出现，带来了高度私人化的“独听”聆听方式，为一些青年亚文化群体提供了躲避和抵抗主流文化收编的声觉空间；与此同时，其也阻碍了有机社会声音共同体的形成。“生生美学”的“共生”核心要义，可为现代公共社会文化治理提供重要启发——通过探寻“共听”路径，打破单个、封闭的独听空间壁垒，促成听觉经验的共享与流通，进而构建动态平衡且对整体生态具有积极意义的声音生态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成立，以听者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为前提，依赖于声音信息的双向交换与听者主体间的有效互动，而非单纯的声音信息单向输出；同时还需坚守生态性立场，将生态意识贯穿于共同体构建的全过程。在前现代听觉史研究中，“共听”类听觉活动的社会功能已得到诸多实证：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从感官史视角，考察

了19世纪法国乡村钟声象征意义的变迁;理查德·卡伦·拉斯(Richard Cullen Rath)分析了早期北美教堂的声学结构对民众信仰的引导与塑造。而“共听”的理念,更能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寻得深厚渊源——《乐记》提出“乐统同”,强调“乐”可跨越身份、地域、语言与文化的隔阂,而中国古代“乐”要实现“礼”的有效传递,其最佳倾听方式正是“共听”——“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11][145]}“共听”之“乐”,对于听者一视同仁,共享同一“乐”的听者在“乐”面前无高低贵贱之分。这一思想并非向社会内在结构的同质化,而是可以启发在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中构建生态化的音景,运用声音的组织 and 建构能力优化总体生态,发挥声音生态对整体生态环境的调节作用。

声音共同体具备若干可辨识的核心特征:其一,声学信息丰富多元。共同体内部声音类型多样且清晰可辨,各类声音和谐共存的同时,亦存在具有辨识度的标识性声音及其变体。其二,声音信息兼具类型与层次的复杂性。共同体成员能够解码声音符号的深层意涵,外部听者却难以洞悉——这与阐释人类学中的“地方性知识”逻辑相通,即声音符码已被嵌入专属该共同体的文化信息体系。其三,具备调节音景平衡的功能性机制。这一机制的运作牵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社会维度。自然生态的声音共同体具备自我调节能力,各声音要素通过持续互动和信息传递实现自然界声音生态的平衡。声音能量的存在时效短,传播距离有限,不同频率声音的响度也存在上限。声音因其物理特性而具备有限性,这也是声音生态能够进行自我动态平衡的基本原理。在前工业化社会中,人类社会的音景随自然音景节律而动。因为尚未有标准化、机械化的声音生产出现,社会音景错综复杂。工业化时代则开启了声音的去差异化过程。以声音生态的立场看,这一时期,许多声音被迫走向“物种灭绝”。“福特式生产”诱生对功能性音乐的利用,如传媒广告、商场背景音乐对消费的引导作用。功能性音乐的泛滥,时常造成社会音景的个性化丧失,同时也加剧社会“区隔”——有意图安排的声音“越来越协助人们达成预设的区隔意图并放大对特定社会团体

的邀请”^[16]。因而,主动察觉并分析声音生态是走向建立“共听”机制的首要步骤。重新认识既有声音经验,是促成各种声音有机“共生”的前提。

“生生美学”具备开放性与包容性特征,是建立声音生态共同体的良好载体。在“生生哲学”汲取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可以发现“乐”在建构声音共同体时发挥了认同功能。在中国古代,“乐”是中国认同的象征:“中国的‘乐’——古‘乐’,以及它所代表的全部——都是标志着‘中国认同’(Chinese identity)的图腾或象征。”^{[9][151]}如同各地风景中存在“地标”一样,在声音共同体中也要建立承载集体记忆、历史意义和共同情感结构的“声标”(sound mark)。声标既能塑造共同体的特质,也对生态系统发挥正向引导作用。于声音共同体内部构建具有鲜明标识性的声音符号,能够为共同体注入“向心力”与“凝聚力”。声标所承载的声音信息及听觉经验,可供共同体成员共同分享,是实现“共听”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艾略特(T.S. Eliot)与希翁(Michel Chion)都认为声音能够启发人们的“听觉想象力”(auditory imagination)。创造声标的核心目的,在于激发社会层面的听觉想象力。这种听觉想象力不仅能勾连个体的过往记忆与集体的历史经验,更能借助创造性想象,勾勒出未来音景的可能图景。这与中国古典美学中“外声内听”的理念相契合——文学、影视、音乐等各类艺术作品承载的声音信息,能够有效触动听者的内心世界,唤起深层情感共鸣,使其与声音背后的历史脉络、社会语境及文化底蕴形成深度联结。与此同时,特定的声音符号还能填补听者的听觉想象空白,既满足其既有的声音期待,也催生全新的声音诉求。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当代生态美学中的声音生态问题不能忽视人的个体维度。我国早期的生态文学定义,为彰显自然的主体地位,不可避免地弱化了人的主体地位^[17],而以“生生美学”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生态美学,显然有意回归人的个体层面,在对声音生态的考量过程中也更注重以人为本。在“生生美学”的“共生”视域下吸纳听觉与声音批评视角,能为生态美学议题中人类主体性的在场提供坚实保障。因此,我们既要倡导“共听”,也不能遮蔽“独听”对审美价值的独特贡献。中国古典诗歌中,“独听空阶雨”“独

听月明中”“独听钟声觉寺多”等个人化书写便是明证。相较于“共听”，“独听”往往更能彰显意境的幽远与韵味的绵长。声音共同体中的环境声在社会层面承担着类似“语言”的沟通功能，

“共听”是实现“共生”的重要路径，但这一过程离不开共同体成员个体对声音信息的识别、解码与处理能力。由此可见，在推动“共听”活动开展的同时，“生生美学”所蕴含的个体关怀与化育万物的理想，也需要通过“独听”的审美实践得以落地——唯有“共听”与“独听”相辅相成，才能最终实现包容且完满的声音生态共同体建构目标。

生态美学的研究始终聚焦全球共通的生态议题。程相占提出的“生生美学”立足中国立场，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它以当下现实为观照基点，同时不断返归传统探寻优化路径，为世界生态美学研究贡献了极具价值的中国经验。这一理论既吸纳了全球生态美学思潮的经验教训，又着力破解“过度尊崇自然”与“全然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困境，以审美为核心旨归，理性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大乐与天地同和”，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声音便作为人类栖居生态中无形却关键的存在，在人类认知世界、感知万物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生生美学”是具有鲜明中国本土性特征的理论话语，而听觉审美范式正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标识，对听觉与声音生态意识的深层考量，恰好能与“生生美学”观照整体、生生不息的核心特质相互映照、彼此成就。由此，“生生美学”可在当代中国生态美学视域下，主动吸纳文化批评领域“听觉转向”“声音转向”的话语嬗变成果，在理论的当代转换中接入“音轨”，进而为生态美学问题提供感官文化研究维度的深入阐释与疏通。作为“生生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变量，声音生态议题早已在国际学界获得持续关注，成为推动中国当代生态美学话语实现国际化转型的重要助力。与此同时，声音所具备的跨文化沟通属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语言”的交际功能，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及其生态思想的“可译性”海外传播搭建有效桥梁。

参考文献：

- [1] 曾繁仁. 生生美学 [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3.
- [2] 傅修延. 为什么麦克卢汉说中国人是“听觉人”：中国文化的听觉传统及其对叙事的影响 [J]. 文学评论，2016(1)：138.
- [3] 程相占. 生生美学的第二个十年进程 [J]. 南方文坛，2025(3)：64.
- [4] MARSHALL M.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 27.
- [5] 钱锺书. 谈中国诗 [M]// 钱锺书. 钱锺书散文.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534，537.
- [6] 傅修延. 听觉叙事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265.
- [7] 叶维廉. 中国诗学 [M]. 增订版. 合肥：黄山书社，2016：226.
- [8] 汪树东. 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意识的来源 [J]. 天府新论，2009(3)：142.
- [9] 苏源熙. “礼”异“乐”同：为什么对“乐”的阐释如此重要？ [M]// 刘东. 中国学术：总第16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10] RAYMOND M S.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7.
- [11]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第三十七：乐记第十九 [M]. 郑玄，注，孔颖达，疏.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2] 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 麦克卢汉精粹 [M]. 何道宽，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364.
- [13] 汪树东. 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四个局限及可能出路 [J]. 长江文艺评论，2016(4)：23-24.
- [14] 程相占. 生态智慧 C 及其新关键词“共生” [J]. 上海城市规划，2018(4)：132.
- [15]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0.
- [16] ROWLAND A. Ecology of Sound: The Sonic Order of Urban Space [J]. Urban Studies, 2007, 44(10): 1912.
- [17] 龙其林. 非人类中心膜拜、生态批评泛化及思想主题癖：对当前国内生态文学研究中常见问题的批评 [J]. 青海社会科学，2018(4)：159-164.

责任编辑：黄声波